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上册)

 中国金融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第六卷
(上)



发展与发展政策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y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纪沫 仝冰 渔荣

陈雨露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

总策划：林铁钢

责任编辑：何 为

责任校对：刘 明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与发展政策 (Fazhan yu Fazhan Zhengce) / (美) 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J. E.) 著; 纪沫, 全冰, 海荣译.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 7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6)

书名原文: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SBN 978 - 7 - 5049 - 4250 - 0

I. 发… II. ①斯…②纪…③全…④海… III.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IV. F11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879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55 毫米 × 235 毫米

印张 33

字数 592 千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0 元 (1—6 卷)

ISBN 978 - 7 - 5049 - 4250 - 0/F. 3810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263947

目 录

第六卷导言	1
新发展经济学	3
市场、市场失灵与发展	16
理性农民、有效制度与农业组织理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评述	26
现代经济理论与发展	37
发展理论与实践	102
更丰富的政策工具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迈向后华盛顿共识	102
21 世纪的发展议程	122
迈向新的发展模式：战略、政策与过程	136
市场经济下的发展战略框架：目标、范围、制度与工具	164
农业组织理论	192
农业组织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政策	192
分成制与农业市场的关联性	218
转型经济学	249
改革何去何从？——论 10 年转型	249
“激进式改革”之后？部分国家法治建立的障碍	284
谁来看管看守员？	320
政府的作用	347
再论政府的作用	347
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373

关于政府作用的新视角·····	401
改革 ·····	414
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414
改革全球经济结构：从近期危机中得到的教训·····	445
中国改革 ·····	459
信息、计划与激励·····	459
体制创新与地方政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 对中国广东省的案例分析·····	470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改革·····	485

第六卷导言

本卷转向研究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其中收录了我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发表的重要论文和演讲稿，在此前后撰写的一些学术性与应用性论文，以及几篇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文章。

本卷第一组论文提出了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去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无论如何发展政策应该认识到市场的这些局限性。这有助于对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设为依据的）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批评性分析需要更加深入。由于这些政策只是将发展简单地视为资源的积累，所以只要市场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提高。但是，我认为，发展的含义甚为宽泛，其中包括社会的基本转型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知识差距的消除。

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理解农业部门中的经济组织就非常重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分成制和放款人（money lenders）等制度安排发挥着重要作用。忽略这些制度（比如只是简单地考察劳动力和土地的供求关系），就不可能理解农业部门。通过几篇文章，我构建了一个农业组织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信息的不完美性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分成制持续存在的原因，以及其他像信贷、劳动力、土地和产品市场相互关联这样一些特征之所以会存在的根源。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经济试验。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对比，就会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失败了，而中国成功了。我认为，有些关键性的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强调创建新企业，俄罗斯则强调私有化老企业；中国强调实质性的稳定，俄罗斯则强调价格稳定；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很薄弱，但中国却通过乡镇企业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近年的讨论则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在讨论公

司治理问题时)。但是,在“‘激进式改革’之后?部分国家法治建立的障碍”这篇文章中,我和卡拉·霍夫(Karla Hoff)指出,经济学和政治学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像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高利率等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建设法治社会的激励。

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反映了改革的一个共同问题。与实施改革或组织改革的拥护者相比,只是说说政府应该做什么那真是容易多了。这些经验是我撰写“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一文的基础。

除了转型之外,20世纪后半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事件可能就是始于东亚的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此后来有许多争论——包括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怎样做才能防止下一场危机的爆发。虽然我就此主题写过大量文章,但是发表在《金融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e*)上的短文却是一个颇为中肯的综述。

本卷最后三篇文章是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不同时间点,对中国的转型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我在Wingspread会议中心所作报告的底稿,关于这次会议,我已经在第一卷的导言中介绍过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写的东西,我认为对竞争(相比私有化)重要性的强调是正确的。

1990年,我受世界银行之邀,帮助他们分析东亚经济为什么会成功。这个研究项目最终为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引用率很高的书《东亚的奇迹》(*The East Asia Miracle*)。作为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与钱颖一教授在广东考察了一段时间。在我们两个合作撰写的文章中已经说明,地方政府在广东省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后一篇文章是我与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他接替我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阿萨·胡塞因(Athar Hussain)合作撰写的。我们力图从比较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功。

新发展经济学*

基于理性农民不完美信息与信息成本的农业组织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很多现象提供了简明的解释。它对为什么分成制 (sharecropping) 如此普遍，以及分成制为何采取特定模式，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它也对信贷市场和土地市场的联系，以及成本共担的模式做出了解释。本文认为，这一理论比竞争理论更好地解释了这些现象。这一理论可以被视为更一般的范式，即“不完美信息范式”的重要应用，而不完美信息范式对解释各种经济现象非常有用，包括竞争、寡头和垄断；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和产品市场；以及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各种经济现象。

一、引言

在过去的 15 年中，我一直努力建立一个对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过程的一贯性的主张，以辨别它们与发达国家在哪些方面相似，在哪些方面不同和为什么不同？¹ 这里我无法对这些主张做出总结陈述。我现在的任务是，展示其中与农村部门经济组织有关的方面，并且解释为什么我（或者其他人）应该“相信”这些理论，或者至少，为什么它们比其他一些广为讨论的理论更合理。

我的研究遵循了以下五个主要原则：

1. 个体（包括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农民）理性，即他们以（合理）一致的方式行事，并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改变。
2. 信息具有成本。这有很多重要的含义：个体无法获取完美信息，因此他们的行为与信息完美环境下的行为有显著的差别。当个体从事交易（购买劳动力服务，信贷，租用土地或牲畜）时，对所交易的物品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完美的。因此，完美信息假定下的理想交易可能不会发生。同样地，某些合同（比如，根据一定的标准提供特定的服务）可能是不可行的；

*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14 (2), 1986, pp. 257 - 265. 我很感激与 A. Braverman 以及 R. Sah 进行的有益的讨论。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力支持。

1 有关这项工作某些方面的两个综述，参见 Stiglitz (1982b、1985)。

特别是事后很难辨明这些服务是否已经提供，或者很难鉴定服务质量好坏的情形下，合约更是难以执行。

3. 制度能够反映这些信息成本（以及其他交易成本）。因此，制度被看作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并且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制度结构发生滞后性的变化。

4. 个体理性以及制度内生于信息结构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具备（帕累托）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只在阿罗（Arrow）和德布鲁（Debreu）所探求的特殊环境集合下是可得。这个集合包括一组完全市场和完美信息，这些条件在发达国家是否存在是可疑的，而在欠发达国家显然是毫不相关。由于信息不完美和市场不完全，欠发达经济几乎总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无效率，也就是一系列税收和补贴的存在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福利。

5. 这意味着政府可以起到潜在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可以带来帕累托改进，如果（i）政府对经济结构有充分的信息；（ii）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至少拥有与私有部门同样多的信息；（iii）那些负责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的部门，存在激励引导政策实现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实行收入再分配（将收入从穷人转移给富人或者反之，或者将收入从每一个人转移给另外的人）——这种再分配通常会带来国民产出的重大损失。信息问题，包括激励问题，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一样重要；我们对后者研究的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者中不存在信息和激励问题。因此我们在建议政府采取某些行动弥补市场缺陷时一定要保持谨慎。

二、农业组织理论概述

在本部分，我将说明上述的一般性方法对于农业部门经济组织的见解。在各个欠发达国家可以观察到很多种制度安排。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分成制颇感兴趣。对分成制的早期观点是，它是一种无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工人的所得低于其边际产出价值，因此他们缺乏激励努力工作。问题是，这种看起来无效的经济组织形式为什么能够存活如此之久（以及为什么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期，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对那些甚至相信经济理性的人们来说，需要找到一些解释。

可以想到的一个解释是，农民对风险的厌恶更甚于地主；如果工人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将要承担全部风险。工人的风险厌恶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还可以有其他的（也许更加有效）风险分担安排。尤其是，通过实行工资制度，可以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工人不承担

风险。工人可以作为工资劳动者进行工作，也可以在自己或者租来的土地上工作，通过将时间在这二者之间适当分配，可以实现工人和地主之间任何程度的风险分担。²

对分成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解释是，当存在监督成本时，它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体系。因为在工资制度中，工人的收入不是直接与产出相关，地主必须花费资源来确保工人真正在工作。在分成制中，由于工人的报酬直接取决于其产出，他受到工作的激励。这种激励可能不会像他们自己拥有土地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只能得到一部分（比如，一半）产出）；但这种自己拥有土地的风险安排忽视农民的风险厌恶。因此分成制代表这样一种折中：在租赁制度（rental system）中，激励是“正确的”，但工人承担所有的风险；在工资制度中，地主承担所有风险，但只能通过监督使工人努力工作。这一新观点（Stiglitz, 1974）彻底转变对分成制的传统批判：正是由于相对于工资制度的激励性质，分成制才得以广泛采用。

但是租赁制度提供正确激励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租赁制度为佃农努力程度的决定提供了正确激励。但是佃农还要做出许多其他决定：包括对技术的选择、化肥的使用、收割时间的决定等。这些决策会影响产出的风险程度。例如，许多高产的种子平均产量较高，但对降雨却很敏感。每当存在违约的可能（即佃农不按照承诺支付租金）时，在租赁制度下，佃农就会缺乏做这些决定的正确激励。当然，在租赁制度下，由于是无限责任，使佃农承担了所有的成本。但是即便佃农做出所有的“正确”决定也可能仍然无法缴纳租金，并且常常很难辨别个体是否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大多数社会都不愿给予佃农无限责任，或采取如债务人监狱这样的极端措施，来确保个体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³因此，实际上，佃农承担的一部分风险成本是由地主承担的。⁴在分成制度下，地主和佃农面临同样的风险。⁵

因此，可以把分成制视为基于以下原因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a）工人方面的风险厌恶；（b）当佃农无法支付租金时，迫使其支付租金的能力（或愿望）有限；以及（c）监督佃农行为的能力有限（或者这样做的成本很高）。

2 Stiglitz (1974) .

3 事实上，这种极端的措施会产生有害的激励效应，从而阻碍风险承担。

4 Johnson (1950) ; Allen (1985) .

5 Johnson (1950)、Braverman and Stiglitz (1982a) 强调了分成制的这一方面。参见 Stiglitz and Weiss (1981)。

一般性的理论已在许多方向得以拓展，我这里只对其中的三点加以讨论：成本分担、相互联系和技术变化。

在许多情况下，除了劳动力和土地，还有其他重要投入，比如耕牛或者肥料。如何支付这些投入？显然，如果工人支付全部成本，而只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他将没有足够的激励来提供这些投入。成本分担是一种补救方法。如果工人得到50%的产出，并支付50%的成本，他会有正确的激励：成本和收益都被减半。⁶

成本份额等于产出份额的规则看起来合理，但并不普遍。如何解释经济现实对这一规则的偏离呢？为寻找答案，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一般理论框架，强调不完美信息的作用。首先，如果增加施肥可以增加边际劳动产品，则相对于50—50的规则，显然地主希望佃农更多地提供肥料，从而诱导工人更加努力工作。请记住，地主的核心理论是他不能直接控制工人的行为，他必须诱导他们努力工作。使用分成制的原因是它能够提供这些额外的激励。

但如果成本分担安排可以实施，这意味着可以对支出予以监督。如果对投入的支出能够得到监督，就没有采取成本分担的必要。相反，可以在合同条款中规定不同投入的水平。但一般来说，工人相对于地主对当前环境有更多的信息（用时髦的技术术语来说，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对投入水平作具体规定的合同，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成本分担合同提供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和激励，从而比简单规定投入水平的合同更加有效率。⁷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中，经济组织的另一特性是市场的相互联系：地主在出租土地的同时，也会提供信贷（他还可能提供食物和其他投入）。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相互联系？一些人认为这只是地主剥削工人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稍后将对这些解释加以评论。现在，我们仅仅指出，我们的一般性理论能够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流行（在竞争和非竞争情形下）。我们已经一再指出地主的任务是诱导工人努力工作，并且做出从他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决定（关于技术选择、收割时机等的决定）。对于贷款人来说，存在完全类似的问题。他们担心借款人会拖欠贷款。拖欠的概率部分地取决于借款人所采取的行动。佃农—借款人的行动因此既影响贷款人，也影响地主。需要注意的是与地主签订的合约的条款也会影响贷款人，反之亦然：如果地主能够通过提供更多的肥料来降低违约概率，贷款人的福利会增加。借款人的行为

6 Heady (1947)。

7 Braverman and Stiglitz (1982b)。

(包括努力程度和技术选择) 会受个体负债的影响, 因此地主的(预期) 收入可能受负债金额(条款) 的影响。在地主和贷款人的行为之间, 显然存在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外部性。对于这种外部性, 一个自然的市场办法是将外部性内部化, 而这正是市场间的相互联系所能够实现的。⁸

因此, 相互联系是由提高经济效率的愿望导致的, 不一定是由于地主想进一步剥削工人。

相互联系的特征反过来与地主拒绝有利可图的创新的激励相关联。例如, Bhaduri⁹ 认为, 地主—债权人会拒绝创新, 因为创新会减少对信贷的需求, 从而减少他们作为债权人的收入。布雷弗曼(Braverman) 和斯蒂格利茨¹⁰ 证明, 创新并不必然导致信贷需求降低。信贷是用来平滑各期收入的, 而在相当合理的条件下, 创新既可提高也可降低信贷总需求。但他们进一步认为, 信贷需求的变化并不是重点。

核心问题是, 创新是否使经济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向外或向内移动。效用可能性曲线是, 在一方(工人) 的(预期) 效用水平给定的情形下, 另一方(地主) 的(预期) 效用的最高水平。与经济现实相关的效用可能性曲线考虑到信息问题, 而后者正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 例如, 在存在分成制时, 个体激励与没有监督成本时不同。没有监督成本时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可能以一种方式移动, 而现实经济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会以另一种方式移动。因此存在某种创新, 可以在每一种投入水平上提高产出, 同时, 会恶化激励—监督问题。这样的创新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合意的。地主将抵制这种创新, 尽管从“工程”的角度来看, 那样的创新是合意的。

从这一角度看, 相互联系对于是否采纳创新的影响是模糊的。有些创新在具有相互联系时会被采纳, 而没有相互联系时则不会被采纳, 反之亦然; 但是创新对信贷需求的影响, 似乎并不重要。

尽管地主会为创新的激励—监督后果感到担忧, 但是不能仓促得出结论, 地主总是做出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决定, 或者地主总是做出具有社会效率的决定。在竞争的环境中, 如果在现有的价格(或合同条款) 下, 采纳

8 Braverman and Stiglitz (1982a)。在更一般信息理论文献中, 在多重委托—代理问题中对此进行了讨论。我们这里讨论的外部性几乎出现在所有的道德风险问题中。参见 Arnott 和 Stiglitz (1984)。

9 Bhaduri (1984)。

10 Braverman and Stiglitz (即将发表)。

一项创新有利可图，地主就会这样做。当然，当所有的地主都采纳创新，价格（合同条款）会发生改变，这可能对地主产生不利。¹¹在竞争环境下，尽管一项创新可能对地主不利，他们不太可能抵制创新（相反，如果他们处在“垄断”地位，他们将不希望抵制这样的创新，因为他们将获取所有与创新相关的剩余）。

但是，正如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时，市场配置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即便是完全竞争经济也是如此），与创新有关的市场决策也不是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我们使用受约束的帕累托有效来表明我们考虑到了对信息的限制；我们假设政府不拥有任何私人个体不具有的信息）。尽管从原则上讲，存在可以使每个人福利增加的政府干预（考虑到信息费用），这种帕累托改进的干预是否可能从政治过程中产生，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其他理论

在这一部分，我希望总结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理论，它们对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有一定的解释力。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我的观点处于其他更极端的观点之间。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市场的环境中工作。根据这一观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异，并不在于精明的、效用最大化的农民和未受教育、依习惯行事的农民之间的差异，而主要在于经济环境的不同、由这些经济生产的产品不同、它们的禀赋不同，以及它们的禀赋被用于生产产品的方式不同。根据这一观点，分成制是对风险分担问题的理性反应。但是对于我上面阐述过的激励问题，给予的关注较少。当存在完美信息并且合约可以完全执行时，分成合约可以实现理想的劳动力供给水平，并实现有效率的技术选择。这些理论对其他一些我已经讨论的现象几乎未作解释：相互联系、技术变化和成本分担。相互联系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的优势来解释，但是如果交易成本是核心因素，我们只能观察到简单的成本分担规则（成本份额等于产出份额）。

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受习俗和制度支配，这些习俗和制度在较早些时候具有某种职能，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这

11 如果在现有价格下，创新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那么合同条款可能会变得更有利于工人，而使地主的福利降低。这和更简单情形下的庇古（Pigou）土地—储蓄创新相类似。

种职能。这一方法（我将其称为制度历史方法（institutional - historical approach））试图描述那些存在分成制、相互联系的市场和成本分担的欠发达国家。它试图把当前的实践与早期的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这种制度历史方法可能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导致了分成制的建立，或者信贷体系的发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即，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建立了相似的制度结构，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成本份额等于产品份额，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二者并不相等。根本问题是，理论必须解释早期的实践是如何形成的，而为了解释这些，又不得不诉诸其他理论。因此，从其自身来讲，制度历史方法是不完全的。

还有第三种观点强调农业部门不具备竞争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主剥削工人的能力。在一些情形中，工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法律约束会使地主处在剥削工人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需要解释地主是如何运用他们的强制力的。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存在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很多地主在丰收和播种时节需要工人，工人可以选择为谁工作。重要的是，剥削假设不能解释存在很多地主的情形下，他们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剥削。¹²更一般地，它不能解释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剥削程度为何会有所变化。工资低的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剥削的存在：如果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很低，竞争市场中的工资同样会很低。

剥削假设同样也不能解释农业组织的内在结构：为什么成本份额会如此分配，或者那些剥削工人的地主为什么（或者如何）运用信贷市场来获取进一步剥削的能力。

所有的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些正在消逝的制度和习俗。制度结构显然并不随着环境的变迁而迅速调整。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的是辨别社会行为的系统组成和规则，从而探求众多现象背后的一般原理。描述在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制度是有益的，但是远远不够。

因此，我将理性假设作为一个方便的起点，借助这个简单的一般原则，来理解经济行为。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些不符合理性假设的事实。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找系统性的偏离。Tversky 在文章中指出，在个体的概率判断，特别是小概率事件中，存在系统性的偏离。但是

12 关注重复博弈的最新研究表明，合谋的产出即使在非合作情形下也可以实现。因此，如果农业经济中地主的流动性受限制，并且单个社区中地主的数目很少，则他们很可能采取合谋行动。然而，这些非合作性合谋安排产生的情形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Binswanger 1978 年的研究指出，相对于不重要的决策，在“重要”决策中，与理论的背离显得较不重要。很多行为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可以被解释为在不完美信息下的“理性”决策。

我同样也把竞争假设看作一个方便的出发点。¹³许多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可以不依赖于剥削假设而得到解释。一定程度的不完全竞争，与不完美信息框架并不是不一致的：不完美信息框架部分解释了完全竞争的存在；它有助于辨别地主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更为方便地剥削工人。而且，只要不完美信息制约了垄断地主从工人那里抽取剩余的能力，不完美信息框架就可以为地主如何增加垄断利润提供思路。我们发展的相互联系理论，因此可以被应用到垄断地主的行为分析中。

还有另外一种理论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事实上，它与我支持的理论紧密相关：即交易费用方法，它试图通过交易费用来说明经济关系。信息成本是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其他情形中也会产生信息问题）。我对交易费用方法的保留之处在于，它缺乏针对性（specificity）：信息范式的理论结构清晰，使我们可以推导出明确的定理（例如，可以推出合约的结构），而交易费用范式却无法做到。因此，交易费用范式可能就为什么采用成本分担有所见解，但是对成本分担协议的条款却无法提供思路。交易费用范式可能会认为，范围经济对为什么地主也提供信贷做出了解释，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地主—债权人会补贴信贷，或者何种情况下他会为信贷“课税”（tax it）。而且，信息范式可以识别出影响地主和债权人之间外部性程度的参数，从而在原则上可以辨别出哪些环境下更可能出现相互联系；而交易费用范式只能说明在范围不经济超过了范围经济的一些情形下，不存在相互联系。

四、评估不同理论的标准

在前一部分，我简单地讨论了一些主要的理论假说。在本部分，我想列出用于评价理论的一组标准，并且利用这组标准评估这些不同的理论。这些标准不存在创新性；这里不打算提供一个一般性的认识论方面的理论。¹⁴而

13 事实上，在劳动力流动性有限的条件下，小村庄中的劳动力市场不太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同时，地主远远不是劳动力垄断者。相对于寡头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完全竞争模型，现实世界用“垄断竞争模型”来描述可能更为合适。

14 类似地，这里无法对不同的认识论理论（比如，Karl Popper 的理论）做出评价。

是从一个“实践工作者”的角度来提出这些标准。

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分为两组：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标准包括：¹⁵

(a) 内部一致性：公理（暗含的假设）相互间一致吗？结论是由这些假设推出的吗？

(b) 简单性：一般地，解释给定现象所需要的假设越少越好。

(c) 完全性：模型的假设应该是尽可能的“原始”。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过价格刚性解释失业的理论是不完全的；它对价格为什么是刚性的问题没有做出解释。

外部的标准包括：

(a) 可检验性（或者证伪性）：原则上理论至少要有一些可以检验或者证伪的含义；即至少可以设计思路试验，在其中理论的某些含义可以被拒绝。

(b) 外部一致性：模型的所有含义是否与观察的事实一致？注意模型含义包括那些可以从假设直接推出来的（明显直接的含义）。因此，如果一个假设本身被否定，模型将不具备外部一致的性质。根据这种观点，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理论只应该依据其结论是否有效来评判的论断是错误的。如果一个理论的假设不合理，即假设本身可以被证伪，或者假设有其他不可接受（即可以被证伪）的含义，则这种理论应该被拒绝。许多“坏”理论的一些含义有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上，大概所有理论的某些含义都会与数据（至少是对数据的某些解释）不一致。但是一个好的理论应该没有含义与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的情形。

(c) 外部完全性：理论应该可以解释研究领域所观察到的尽可能多的规则行为。因此，如果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分成制，又可以解释份额的决定，则这个理论好于只能解释分成制为什么存在的理论。这与以下标准紧密相关：

(d) 特定性：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做出尽可能多的与特定现象有关的具体预测。

(e) 预测力：一个好的理论不仅与已经观察到的规则行为相一致，而且应该能够预测没有被观察到的新的规则行为。

(f) 一般性：同一个普遍性假说应该能够解释在不同情形下观察到的

15 这里不打算穷尽所有的标准。在其他情形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强健性；理论的结论应当对假设的微小变动不敏感。

现象。

我现在想要依据这些基本的标准来考察不同理论的性能。我认为，不完美信息范式在所有的标准上面表现良好。这一领域研究的特点是，清晰地陈述假设，并从假设中推导结论：它在内部一致性标准上表现得很好。同样地，它在另外两个内部标准上也表现得很好：假设简单而且合理的“原始”。尽管在大多数的工作中，信息技术被视作外生给定，但在目前的一些研究中，信息技术被看作内生决定的。理论提供了特定的可以被检验的预测，事实上，对于农业经济组织的每一个方面都有解释。它对于欠发达国家的许多规律现象做出了预测，不幸的是，这些还没有得到严格检验。同时，不存在明显的规律现象与理论预测不一致。

最吸引人的一个性质是，信息范式提供了一个一般性框架，可以同时被应用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市场中，分成制中讨论过的努力和技术选择问题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了。这个特征与“理性农民、完美市场和完美信息”范式相类似。但是后面这个理论没能对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差异提供很好的解释。

但是，我对“理性农民、完美市场和完美信息”范式（以及相应的发达经济的理论）的主要异议是，它与观察到的许多现象不一致，并且它不能对其他现象提供解释。

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分成制被采纳（在完美信息下，存在很多种等价的合约形式；如果采用分成制，合约会具体说明劳动力供给的数量）。

它无法解释成本分担，特别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成本份额与产出份额不同。

它假设存在一组完全的风险市场；很明显，个体不能为许多重要的风险购买保险，而这对他们的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小村庄，如果地主给劳动者的工资减少一个卢比，他不会雇到任何工人——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在很多情形下，存在工人愿意在现行的工资下工作，却不能被雇佣。似乎存在非自愿失业，而这个现象看起来与古典竞争模型并不一致。

这个理论可以加以修改，以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使它看起来与事实不是那么矛盾¹⁶，事实上，我们的不完美信息范式可以被视作是这样一种修改。

16 当理论由于这些特定的修改而变得复杂时，它就失去了简单性。而这原本是此理论的主要优点之一。